

商务印书馆海外汉学书系

中国伊朗编

〔美〕劳费尔 著



汉学

海外



商务印书馆

中国伊朗编

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

着重于栽培植物及产品之历史

〔美〕劳费尔著

林筠因译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商务印书馆

2001年·北京

Berthold Laufer
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
Chicago 1919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国·伊朗编
〔美〕劳费尔著
林筠因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290-3/K·696

1964年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1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张 14³/₈

定价:22.00元

中 译 本 序

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Berthold Laufer, 1874—1934)所著《中国伊朗编》(Sino-Iranica)是他一生著作中较重要的一种,也是欧美东方学很有代表性的作品。著者本人在语言学、人类学、植物学、矿物学方面都受过专门训练。这本书可以说是他探讨东方名物、语言、制度各方面专门问题所得成果的总汇。书的内容首先是中国和古代西域植物的传播关系。其次是关于中亚纺织品、矿物和汉籍著录的伊朗史上萨珊王朝的官制。附录几篇是关于语言学方面的问题,包括中国境内几个民族语言(蒙、藏、维吾尔)里面若干词汇的研究。书名的副标题是《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意思就是说,中国载籍中保存着不少关于古代伊朗名物、制度、语言各方面的重要资料,这些资料大可补充伊朗在古代史料方面的不足,同时也可看到两方面经济文化接触的一些实况。这些资料的搜集和诠释,对于研究伊朗古史和中国西域关系史,都很有参考的用处。

劳费尔生于德国科伦,肄业于柏林大学,1897年在来比锡大学得博士学位。他受过德国自然科学和考据学的训练,加上法国汉学家沙畹等的影响。1898—1899年他参加了哲撒普(Jesup)组织的北太平洋探险队,在萨哈连岛和东部西伯利亚一带工作。此后他的活动就和美国分不开了。1901—1904年他参加了当时热

心于向中国扩张的美国资本家席福(Jacob H. Schiff)出资组织的探查队到我国探查,1908—1910年他参加了美国布拉克司吞夫人(Mrs. Blackstone)组织的探查队到我国西藏高原一带探查。由于美国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的国家,所以美国的东方学,包括所谓“汉学”,一向落后于欧洲。在二十世纪初年,美国虽然已有六七十年侵略中国的历史,但他们所能举出的“汉学家”还只有一个传教士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和一个挂着“西藏通”招牌的美国公使柔克义(W. W. Rockhill)。当时美国正在加紧争夺远东的霸权,它的一些学术机关就从欧洲(主要是德国)罗致若干东方学者,希望发展美国的东方学。这些外来学者中最主要的就是夏德(F. Hirth)和劳费尔。劳费尔从1910年起在美国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工作,并从1911年起充该馆人类学部主任达二十余年之久。他著作很多,在美国东方学界以淹博著称。但在1934年秋突然跳楼自杀,原因不明。这种悲惨的结果在当时曾引起学术界的震动。

劳费尔这本书本身只是一种资料性的汇篇,他也没有企图在这些资料上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但是对于他的观点和方法,还是有作一些说明和讨论的必要。

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和中亚、西亚的影响关系,欧洲的某些伪装学者曾经提出不少荒谬的说法,其中最骇人听闻的就是法国人拉库普利(Terrien de Lacouperie)的“中国文明西来说”。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初,这种谬说的出现和风行并不稀奇,因为当时欧洲学术界对中国的文化知道很少。拉库普利大胆地宣称《易经》就是“古代西亚亚卡地(Accad)的词汇”,因此“中国人源于亚卡地”。同

时英国牛津大学的比较神话学教授赛斯(A. H. Sayce)在他的《古代东方诸帝国》(Ancient Empires of the East)一书中,也说“亚卡地是西亚的中国”,因为“教育发达,人人皆能书写,用象形文字,字皆直行,谐音会意,兼而有之”。此外还有一个英国的所谓“中国通”达格拉斯(Douglas)在1883年发表研究,宣告老子是中国的黎族人,在滇缅交界建立婆罗门教,老子所谓“道”即“婆罗门教义”。^①这类谬论暴露了当时西方资产阶级挂着学术招牌的某些人任意歪曲史料,企图抹煞中国文明的恶毒用意以及他们自己的极端无知。但是这种卑劣的欺骗就在西方学术界中也被看作不值钱的。曾经翻译中国多种经籍的理雅各(James Legge)就在1885年发表文章驳斥拉库普利。因此这些伪装学者在欧洲比较认真研究资料的“汉学界”中,也没有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是他们的影响仍在不断散布,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初年,拉库普利的著作被介绍到日本,对于亚洲中西部历史不甚了解的中国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居然引为新奇可喜的学说(如章太炎一度也相信这说法。)

有人认为劳费尔受拉库普利的影响很大,这倒是误会。劳费尔这本书所研究的正是中国文明和中亚以至西亚的关系,他并没有接受“中国文明西来说”的捏造。他还认真地驳斥从贝烈史奈德、李希霍芬以至夏德强调中国许多植物,不仅葡萄和苜蓿,都是张骞从西域移植来的错误见解。他主张即以葡萄而论也是经过长期过程才完成了移植的历史,因为一种植物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搬

^① 详见《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 1885年,第616页所载英国报纸的消息,和第695页的批评。

过来的。他也纠正了一些人(主要是贝烈史奈德)遇到带有“胡”字的植物就断定为外来的(“尤其是亚洲西部来的”——贝烈史奈德说)的看法,如书中第六章关于胡麻的讨论。在序文中,他说“形容词‘胡’字决不能作为标志外国植物的可靠标准。”这些论点应该说是比较审慎的。

就考据方法上说,本书突出的一个缺点是在于过分依靠语言学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古代语言资料的研究是重要的,但这本身有很大局限性。对音和还原工作是必要的,但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只能是假定的、不可靠的根据。问题就在于这几十年欧美最流行的东方学往往满足于一些较零碎的语言材料的研究,甚至缺乏根据的虚构而引申出一个牵涉范围很广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实际上不可能是确当的。就本书的植物方面而论(那是本书的主要部分),作者以为可以写出关于人工栽种植物的一部最完备的历史。事实上作者没有也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固然,夏德及其以前的一些欧洲东方学者认为中国许多植物是由张骞带回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是劳费尔自己所主张的一千五百年“植物传播运动”究竟没有得到详细的描写,而更缺乏的是对植物品种的实地调查。所谓“传播运动”,实际上只是等于说中亚和中国或中国国内各地区间有了植物品种的不断传播而已。因此,在这方面,这部书只可以说是作了文献资料的初步整理工作,而对每一植物具体历史的研究还有待中国学者做更切实的调查研究的工作。

书中语言学的虚构很多(主要是中古波斯语),可靠性是有问题的。汉语中也有个别的显然的虚构,例如硬把 Kimkha 的对音拟为“锦花”,这样的杜撰是不应有的。其实 Kimkha 或 Kimkhab

并不是生疏的字,在乾隆朝修的《五体清文鉴》的“回语”(维吾尔语)中,录有此字,相对的汉语作“销金缎”。这就是明代的“金花”缎。

这本书出版于1919年,曾经我国学者先后作过一些介绍。书中矿物学方面有地质学者章鸿钊的《中国伊兰卷金石译证》(刊于《地质专报》乙种第3号),植物方面有向达先生译的《葡萄考》和《苜蓿考》两篇(载于《自然界》第4卷的3,4两期)。为了研究的参考以及了解西方东方学的水平及其观点方法上的问题,此书的全部翻译是必要的。原著征引材料范围很广,译者林筠因同志作了很繁重的查对工作,并在译注中改正了原著若干处的错误。这个译本对于即使能直接阅读原书的读者也是十分有用的。

邵循正

1962年9月

目 录

序言	4
中国伊朗編	31
苜蓿	31
葡萄树	43
阿月渾子	70
胡桃	79
安石榴	101
胡麻和亚麻	113
胡葵	122
胡瓜或黄瓜	125
胡蒜、胡葱、渾提葱	127
豌豆和蚕豆	130
紅花和姜黄	133
麝脂(紅藍)	150
茉莉	154
指甲花	159
胡桐泪	164
甘露蜜	167
阿魏	178
白松香	189
无食子或五倍子	193
靛青	195

大米	197
胡椒	199
糖	201
訶黎勒	203
“金桃”	204
附子	204
芸薹属植物	205
蒔蘿	207
枣椰树	209
菠菜	216
糖萝卜和莴苣	223
苘麻	227
巴旦杏	230
无花果	235
齐墩果	240
阿勒勃与稻子豆	244
水仙	252
阿勃参(巴尔酥麻香)	254
拂林語考	260
西瓜	263
胡芦巴	271
番木鱉	273
胡萝卜	276
香料	280
甜香(280) 苏合香(282) 沒药(285) 青木香(289) 安息香(291)	
马来亚波斯及其产物	294

明矾(302) 蚁漆(303) 樟脑(306) 芦荟(307) 縮砂苗(309)	
婆罗得(310) 补骨脂(311) 烏文木(313)	
波斯的紡織品	316
錦緞(316) 氍毹(321) 越諾布(322) 紡織品(325) 石綿(328)	
伊朗的矿物、金属和宝石	332
硼砂(333) 礞砂(333) 黄丹(338) 紫磨金(338) 盐綠(339)	
五色盐(340) 鎔石(340) 鑛鉄(344) 瑟瑟(345) 翡翠(347)	
綠松石(348) 金精(349) 钻石(350) 琥珀(351) 珊瑚(353)	
娑婆石(355)	
薩珊王朝政府的官銜	358
伊朗中国編	364
方竹(364) 絲綢(366) 桃和杏(369) 肉桂(371) 莪朮(375) 姜	
(376) 黄連(377) 大黃(379) 无患子(383) 庵摩勒(384) 蜀葵	
(384) 中国玫瑰(384) 芒果(385) 檀香(385) 樺树(385) 茶	
(386) 条紋瑪瑙(388) 白銅(388) 硝石(389) 高岭土(389) 土	
茯苓(390) 紙(391) 紙币(394) 汉语外来詞(399) 亚力山大故	
事中的中国人(405)	
附录一 蒙古語里的伊朗語成分	408
附录二 “突尔吉”語里的汉语成分	413
附录三 阿布·滿速儿所著的波斯药理学中的印度語成分	417
附录四 罗勒	426
附录五 西藏語里的外来詞补注	432
汉英譯名对照表	441

序 言

假若我們所知道的古代伊朗文化有如古代埃及或巴比伦之詳，甚或有如印度或中国之詳，那么我們对亚洲文化的发展也許会有与目前大不相同的观念。古波斯的碑文和波斯古經里所保存的文稿寥寥无几，如要重新描繪一幅伊朗生活和文明的完整图画，材料实在很不足。古典作家們的記載虽然給这些残稿添上了一些零星的补充，然而即使結合这些材料，要想重新描繪，仍然会难以令人滿意。所幸在过去十年左右里，对伊朗的認識大为增加了。在东土耳其斯坦所覓得的史料里发现了丰富的文献，是用两种以前人所未知的伊朗語写的——粟特語（Sogdian）和所謂的东伊朗語。^① 現在我們才知道伊朗各民族所居住的地区幅員广大，甚至包括了整个东土耳其斯坦，他們有些移居中国，与中国人发生接触，并深深地影响了不同种族的国家，尤其是土耳其和中国。伊朗人在沟通东西文化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們把希腊思想的遗产传播于亚洲中部及东部，又把珍貴的中国植物与商品帶到地中海地区。他們所从事的活动对于世界和对于历史都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若沒有中国人的記載，我們就无法充分了解当时的情况。中国人是讲求实际的人，对具体事物向来很感兴趣。他們留下給我們大量的有关伊朗植物、产品、矿物、风俗、制度等方面的有用的知識，这些知識对于科学必然会有很大的帮助。

本书讲的是中国对伊朗文明史的貢獻，恰好可以弥补我們对

① 參看伯希和(P. Pelliot)著：Influences iraniennes en Asie centrale et en Extrême-Orient(Paris, 1911)。

伊朗的传统認識上一部分不足之处。有关伊朗各民族历史的中文記載里也有很多古代伊朗語的譯音，其中一部分曾令好几位汉学家和史学家費尽心机；但是这些用汉语譯音轉写的伊朗字极少处理得正确而恰当。虽然研究汉譯梵語已經有了一套成功的方法，对汉譯伊朗語的研究却太不够重視。把古汉语音韵学的规律运用于中伊問題的研究上，应推哥提欧^①为第一人。我願奉献此书以紀念这位伟大的研究伊朗的学者，表示我的敬意。我不但尊敬他之为一位学者，而且也尊敬他的为人，为法国捐軀的一位英雄。^②哥提欧是一位君子，是孔子所謂的“君子”。他笔下处处表现出思想家和天才的智力。我曾长期抱有这种心願：希望能有和他共同商討本文所涉及的各种問題的光荣机会，凭借他的智慧和丰富閱历，必能大为充实本书的内容。——“非夫人之为慟而誰为？”

伊朗的地理名称及种族名称一向是根据史料来鉴定的，有一些处理得正确，有一些不正确。但还没有人試把汉语譯音还原到正确的伊朗字。在这方面的数量艰苦工作还有待我們去做。^③我

① 参看哥提欧(Robert Gauthiot)著: *Quelques termes techniques bouddhiques et manichéens*, 登載在 *Journal asiatique*, 1911, II, pp. 49—67 (特別从第 59 頁起), 和他对沙腕及伯希和二人所作补充的一书 *Traité manichéen*, pp. 27, 42, 58, 132.

② 1915 春发起的阿杜阿(Artois)第一次反攻时, 哥提欧任步兵上尉, 英勇地率领他的連队向敌人冲击, 受了重伤。终于 1916 年 9 月 11 日逝世, 享年四十。参看梅叶(A. Meillet)所写的誄文(登載在 *Bull.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No. 65, pp. 127—132)。

③ 我希望在別处細談這個問題, 因此这里只略举一些例子。达易水(Ta-ho šwi)是波斯首都 Su-li 所在的达易江(参看《隋书》第八十三卷, 第 7 頁)。夏德通过粵語語音 Tat-hot, 又加上亚美尼亚語(Armenian)里的 Deklath 和普林尼(Pliny)所提的 Diglito 鉴定此二字(达易)为“Tigris”。(参看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pp. 198, 313; 和 *Journal Am. Or. Soc.*, Vol. XXXII, 1913, p. 197)。然而汉语 ta 音不能还原为 ti 或 te 音, 只能还原为 tat, dat, dad, dar 或 d'ar 音。而“易”代表 hat, kat, kad, kar 或 kal 音。因此我們可得出的音是 Dar-kat, 或假定

认为我們首要的目标是按照伯希和和馬伯乐所首創和使用的成功的方法,把汉语譯音尽可能准确地用它們古代語音記錄下来,然后从这个可靠的基础上再进而去求它們所代表的伊朗字。主要是按严格的語音原理把中文字正确地写出,这要比只凭乱猜来鉴定好得多。“木鹿”二字是安息(《后汉书》卷116,第8頁)东边疆上的一个城名,被証明和波斯古經里的 Mouru(Muru, Merw)为同一字。^①究竟这在历史上是否正确,我不打算在这里討論。从历史观点看,这种鉴定也許是正确的;但从語音学观点来看,就难以接受了,因为“木鹿”相当于古代的 Muk-luk, Mug-ruk, Bug-luk, Bug-rug, 从这些音也許可以还原为 Bux-rux。^②从伊朗所能得到的語言材料极为稀少,这造成了某些限制:本书所主要研究的题目之一乃是伊朗的植物名称,而这方面流传下来的材料极少,因此常常无法进行鉴定的工作。但是我希望伊朗学者能重視中国人在語言上对伊朗語特别是中古波斯語辞典編輯上的貢獻,因为正确地

經過音位轉換可能成为 Dak-rat。如鉴定为 Tigris,第一音节就产生困难:在古波斯語和巴比伦尼亞語它都是 i 音。古波斯語的 Tigram(由于民間語原而有所改变,參看阿維斯塔語(Avestan)的 tiyriš, 波斯語的 tir“箭”)是袭用巴比伦尼亞語的 Di-ik-lāt(即 Dik-lāt, Dik-rat),它传至希腊語为 Τίγρης 与 Τίγρις,传至伊刺木語(Elamite)为 Ti-ig-ra(參看 A. Meillet: Grammaire du vieux perse, p. 72)。从上面所說的可以看出除第一音节的元音之外,汉语譯音 Dik-rat 符合巴比伦尼亞語的 Dik-rat。目前还不能解釋这第一音节的元音是什么理由,不过将来一定可以推原到一个伊朗的方言。——《太平寰宇記》(卷185,第19頁)提到四个波斯地理名称,但尚未鉴别出是何地方。第一个是城名“褐婆竭”;Hat(r,l)bwa³g'iat。头两个字 Har-bwa 等于古波斯的 Haraiva(巴比伦尼亞語 Hariya),阿維斯塔語 Haraiva,帕拉菲語(Pahlavi)Harēw, 亞美尼亞語 Hrew,——现代的哈烈(Herat)。第三字的意思是“城”。波斯东北部一个隘口的名字“褐离别”G'iat-li-biet 也用这个“褐”字。这里用的 g'iat, g'iar 好像是代表粟特語的 γr, γara(“山”)。“番”或“番兜”(《前汉书》卷96上)古音为 Pan-tav, Par-tav 与古波斯語 Parθava, 中古波斯語 Parθu 完全相同。

①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p. 143.

② 參看派克(E. H. Parker)的說法(1903年的 Imp. and As. Quarterly Review, p. 154),他看出所鉴定的字在語音原理上有些讲不通。

譯成漢音的原始伊朗語几乎全部都可以很準確地還原為伊朗語。中國學者當時有一套合理的方法和固定的規則來翻譯外國字，他們對於研究外語的興趣很濃，這是人人都知道的。現在隨着我們自己的經驗日益豐富，我們更欽佩他們這種規則的可靠、穩固和一貫性。梵語，馬來語，蒙古語以及西藏語的譯音規律也同樣適用於伊朗語。我只請求伊朗學者信任我們的久經考驗的方法。我相信這種請求對於法國學者是不必要的，他們在漢學這一門的各種廣大科目上，和在研究東方的其他門類上，都要算是最先進，最有能力的。我們若能在一章里專門扼要地讲讲中國人所採用的伊朗語譯音方法，和從中國的貢獻來討論伊朗語的音韻學，將是很引人入勝的一項工作。不過在我看來，這種嘗試在目前還嫌過早，因為我們對於漢譯伊朗語的知識只在萌芽的階段，而且許多新證據遲早會從突厥斯坦原稿里出現，這毫無疑問將使我們重新認識伊朗語各種方言的數以百計的新字，而且將大大地豐富我們目前對伊朗名詞學和音韻學很貧乏的知識。考慮到本書的性質，我認為必須採取同一方法來處理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的譯音，這方法是處理所有東方語都習慣用的。漢語研究之落后，從一件事實就可以看出：我們死守着拙笨過時的拉丁語拼音法，用兩三個字母表示一個單音。我的譯音法參閱下面的對照表就可以很容易地掌握：

旧 符 号

語音符号

ng

ñ

oh

č

oh'

č'

j

ž (j 是用来表示膠音的濁音，也写成 dž)

sh

š

其他与旧符号不同的小变动如母音方面，都可以不解自明。为了要做許多比較，包括大量的各种东方語言之間的比較，除了梵文仍然袭用老方法之外，我试图尽可能把譯音方法规范化起来。在东方語里，x 这个字母从来不指 ks 二音的結合，而是指摩擦的清音，有时写成 kh。在慣用 kh 的专有名詞里，我仍然保留着它，也許在其他字里也有时如此。对純技术的事情，我从不过分要求一致。

語言现象虽然重要，但只属于本研究的一个枝节問題。我的主要任务是探索构成物质文明的一切事物的历史，首先是探索栽培的植物、药材、产品、矿物、金属、宝石、紡織品等从波斯传到中国的历史(《中国伊朗編》或《中伊文化交流》)，和其他物品由中国传到波斯的历史(《伊朗中国編》或《伊中文化交流》)。除上面所列举的各项物品之外，还有由波斯传到中国其他种类的东西沒有包括。在本书里，特别是动物，竞技，乐器等。^①关于伊朗动物的稿子我已經写就，将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談，它的目的是要按地理区域，从古代和近代动物地理学的观点，来討論中国人所知道的一切外国动物。关于中国人采納波斯的竞技(特别是馬球)和乐器，以及汉譯伊的地理和种族名称的探討，也同样要留待他日再发表。我希望关于薩珊王朝政府的官号这一章会受到欢迎，因为中国史书所保留下来的材料是初次在这里得到鉴定。在介紹波斯紡織品那一章里也有新的研究成果。

保存在中国記載里的伊朗植物，我們必須辨別下列数类：(一)确由伊朗传播于中国的人工栽培的植物。(二)中国作家所仅仅注意到及描写过的伊朗栽培植物和野生的植物。(三)原属于荣蔬的

^① 在 Chinese Clay Figures, Part I 里討論过在作战、甲冑和战略方面伊朗对中国的影响。

药材及香料。本书的材料尽可能照上面的分类，并按年序安排。每項都编号。除五个附录之外，共討論一百卅五个題目。首先必須說明，这些研究决不想給人以这种印象：以为中国有一部分的物质文明是波斯所賜。我要着重說明的是中国供給我們无限的有用材料，使我們能写出一部細致的关于人工栽培的植物的历史。中国文明的基础有着无限資源，这些植物的輸入对之不起什么作用，正如欧洲文明不因輸入許多东方植物，和近年輸入美国植物而对之起什么作用一样。中国人的經濟政策有远大眼光，采納許多有用的外国植物以为己用，并把它們并入自己完整的农业系統中去，这是值得我們欽佩的。中国人是熟思，通达事理，心胸开豁的民族，向来乐于接受外人所能提供的好事物。在植物經濟方面，他們是世界上最前列的权威。中国有一独特之处：‘宇宙間一切有用的植物，在那里都有栽培。当然这些植物的采納和吸收的过程是一步步进行的。中国人費了数百年的功夫才熟悉了本国植物。他們一系列的本草书籍証明他們对本草种类的知識从唐朝到现在不断在增加，每部书都較前书举出更多的品种。外国植物的輸入从公元前第二世紀下半叶开始。两种最早来到汉土的异国植物是伊朗的苜蓿和葡萄树。其后接踵而来的有其他伊朗和亚洲中部的植物。这輸入运动延續至十四世紀的元朝。十六、十七世紀美洲栽培植物之輸入标志着这种經濟发展的最后阶段，我希望在另一篇专論里来談。除了伊朗之外，中国有不少的栽培的植物是由印度支那，馬來亚地区和印度来的。我們必須知道伊朗植物向中国的移植是一个延續一千五百年的过程；现在学术界中竟有这样一个散布很广的傳說，說大半的植物在汉朝都已經适应中国的水土而成长了，而且把这事都归功于一个人，此人就是名将张騫。我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打破这神話。其实张騫只携带两种植物回中国——